

西安事变 新论

罗玉明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西安事变新论

罗玉明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安事变新论/罗玉明著.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6

ISBN 7-5073-0783-2

I. 西… II. 罗… III. 西安事变 (1936) - 研究

IV. K264. 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902 号

著 者/罗玉明

责任编辑/张文和

封面设计/高永惠

版式设计/罗玉明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怀化建南轻印办公设备公司

850 × 1168mm 32 开 13 印张 3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ISBN 7-5073-0783-2/K. 357 定价: 18.8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言

宋镜明

西安事变是史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从事变发生之日起，人们便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阐述、评价。罗玉明副教授的专著《西安事变新论》一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方位、多层面从新的角度比较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条件，事变发生的经过，事变的结局，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诸因素。全书四章约30万字，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综观全书，有四个最突出最显著的优点和特点：

一、史料翔实、新颖。该书所引文献资料之翔实是同类著作中所少有的，例如引文1000余处，阅读书目达60多种100多本。当然这绝不是史料的堆积，而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将搜集来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的结果。无疑，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一部成功之作的基本条件。该书不仅史料翔实，而且还介绍了以往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和真相，例如，探讨了张学良政治思想转变的历史过程。又比如，考证了张学良八次谏蒋的情况，分析了扣蒋成功的原因，等等。

二、见解独到。该书在阐述西安事变这个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对某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凡的独到的见解。如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和条件：作者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两大矛盾激化、两大矛盾缓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中日矛盾的激化，张、杨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国内阶级

关系的变动，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也推动了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张、杨与中共矛盾的缓和，张、杨之间矛盾的缓和，则推动了停战抗日协定的签订，推动了西北抗战局面的出现和三位一体的形成，从而孕育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又如，分析了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原因，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其中张、杨的和平姿态及采取的军政措施是和平解决事变的第一因素；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的提出和确定则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要因素。此外，南京政府内部和、战两派的对立和配合也起了积极作用；国际和平力量的形成又起了推动作用；全国民众对事变的不同态度，给张学良以动力，又给以压力，是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加之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尤其是手握兵权的黄埔系将领的态度都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三、史论结合好。历史著作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理论著作之处，就在于夹议夹叙，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充分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在该书中随处可见。不仅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和周详的论证，而且有深入的分析和合乎逻辑的结论。

四、人物多，主次分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往往通过后者来演示，西安事变本身即如此。该书涉及的人物多达二十余名，其中自有主次之分。作者着重描述了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周恩来、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也对汤恩伯、胡宗南、刘峙、顾祝同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刘湘、韩复榘以及龙云、盛世才等人的态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述，这样对西安事变的叙述和分析就有血有肉了。

作者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我虽然不是他的指导教师，但担任过多门学位课程的讲授。罗玉明同志的为人和治学态度，我很了解。他为人忠厚诚恳，治学严谨，勤奋读书，勇于探索，富有创新精神。记得他入学不久送给我征求意见的文稿《何应钦与西安事变》，这篇论文就在

《人文杂志》上发表了。相继在《安徽史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还有《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张学良送蒋回宁原因新探》等一系列研究论文，这就为《西安事变新论》的学术专著的写作和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这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既反映出作者的学术功底，也显示了他酷爱史学的兴奋点。我为他的不断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殷切地期望他再接再厉，笔耕不辍，写出更多更新的论文和著作。这是本人的良好祝愿，也是向读者的推荐。

2000年2月
于武汉大学

(宋镜明：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目 录

第一章 西安事变发生的起因和条件

- 一、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 (2)
- 二、局部抗战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 (8)
- 三、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转变 (17)
- 四、张学良政治思想的转变 (27)
- 五、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
停战抗日协定的签订 (38)
- 六、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和与中共矛盾的缓和 (56)
- 七、张、杨的矛盾及其缓和 (70)
- 八、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出现 (78)
- 九、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张、杨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
..... (101)

第二章 临潼扣蒋

- 一、扣蒋计划的提出与扣蒋准备..... (122)
- 二、临潼扣蒋..... (139)
- 三、西安城内和兰州等地的 0 军事行动 (156)
- 四、扣蒋成功的原因..... (160)

第三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诸因素

- 一、张、杨的和平姿态与军政措施…………… (167)
- 二、南京政府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明争暗斗及其相互配合 ……
…………… (182)
- 三、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的态度对张、杨的影响…………… (193)
- 四、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强大推动力…………… (206)
- 五、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对西安与南京的压力…………… (216)
- 六、按兵不动的黄埔系将领，抑制主战派的军事进展…………… (235)
- 七、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242)
- 八、张学良首倡释蒋…………… (257)
- 九、蒋介石态度的转变…………… (275)
- 十、周恩来的“谋主”作用…………… (291)
- 十一、孔祥熙坐镇南京稳定后院…………… (305)
- 十二、何应钦的军事威慑作用…………… (313)
- 十三、宋氏兄妹的营救活动…………… (323)
- 十四、杨虎城的功绩…………… (334)

第四章 和平背后的不和谐音符

- 一、蒋介石玩弄手腕，审判张学良…………… (346)
- 二、在“政治方式解决”幌子下的陕甘善后…………… (357)
- 三、不幸的结局——“二·二事件”…………… (383)

第一章

西安事变发生的起因和条件

西安事变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虽然从事变的发生到事变的解决，只经历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但它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事变本身，它不仅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由于事出突然，事前毫无任何征兆，特别是西安事变发动的主要领导人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再加上国民党当局有意封锁事变的真相，一时间，人们不知事变从何而起，不仅普通老百姓，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中央要员，在震惊之余，也茫然不知，人们只能从国民党的喉舌报刊的攻击和谩骂中、各种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和各种传闻中去推测事变的真相，特别是报刊上具有煽动性的所谓张、杨发动“兵变”的报道，更是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误导。

从事变发生之日起，中外学者便对事变作了大量述评，这些述评有助于我们今天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事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不一样。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起因问题上，更是南辕北辙。中国共产党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国民党方面则认为西安事变是张、杨等受“反动派”的宣传而发动的

“叛乱”；苏、日则互相攻击，都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受了对方的挑唆和指使；如此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布和口碑史料的挖掘，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开始拨开了笼罩着西安事变的层层迷雾，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毛泽东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①又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根据这一原理，我们考察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不难发现，事变发生是两大矛盾激化和两大矛盾缓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

一、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来已久。早在 1872 年，日本便在美国侵略者的支持下侵略我国领土台湾，虽然没有得逞，但日本政府从清政府的赔款中尝到了甜头，从此点燃了吞并中国的欲火。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对外扩张、充当亚洲霸主的野心日益膨胀。1874 年，日本政府制订“征讨大清国策”，1927 年又出台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从 1872 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先后多次发动或参与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较大规模的计有：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1904 年日俄战争、1914 年以对德作战为借口，出兵山东强占胶州湾，1927 年又制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p301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p302

造了“济南惨案”。在这些侵略战争中，日本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特殊利益和军事赔款，形成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占中国的基本态势。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无论是腐败的清政府还是挂着“民国”空招牌的南京政权，都把人民的正义行动视为仇寇，竭力扼杀，对日本的侵略却妥协退让，屈膝投降，这就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气焰，终于酿成了“九一八”惨祸。

1931年9月18日夜间，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部撤至山海关以南，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东北三千里河山，三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前来调查东北事件。为了巩固既得的成果，转移中国人民和国际视线，日本政府一方面于1932年1月28日出兵进攻上海，另一方面扶助溥仪，建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

日本对上海的侵略，遭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率领的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坚持一个多月，打得日本侵略者数次增兵，三易主帅。但蒋介石政府屈于日本政府的压力，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逼迫十九路军退出上海，破坏了淞沪抗战。

1931年年底，日本特务土肥原将溥仪劫持到东北，1932年2月16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讨论肢解中国的方案，18日，宣布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准备建立伪满洲国，定伪都于长春。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粉墨登场，

出任执政。1934年3月1日称帝，建号“康德”。

日本侵略者通过上述两个措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自鸣得意之余，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热河。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康鸿在日本贵族院所作外交方针的演说中宣称：“满蒙与中国关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徵诸该国经纬，当可明了。最近热河境内，不仅时受扰乱治安之策动，而张学良下属之正规军，亦逾越国境侵入热河省。根据日满议定书之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安全，两国有共同维护之责任。因此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日寇要向热河动手了。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占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2月21日，出动十万日、伪军，分三路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领所部东北军望风溃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3月4日，日军仅126名士兵即占领了热河省城承德，热河失陷。日军并未就此罢手，而是继续南攻，于3月9日占领喜峰口，尔后长城各口相继陷落。5月，日伪军进攻察哈尔，多伦、张北、商都等地相继失陷。华北门户洞开，北平、天津处在日军的监视之下。

在严峻的民族危亡形势下，蒋介石依然坚持妥协退让的政策，于1933年5月3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头目黄郛为委员长，准备对日交涉停战。但日本并不予以理会，于5月7日发动“关内作战”，进功滦东地区，蒋军不战而退，自古北口至榆关皆为日寇占领。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黄郛却加紧求和活动，5月22日，黄郛与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日本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日本公使馆驻北平武官平津佐比津晤谈，达成协议四点：一、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二、日军亦不超过上述之线进

击；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全权大员前往密云，对日本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四、以上正式约定之后，定某日某时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定。这一协定，得到了何应钦与蒋介石的认可，以此为基础，5月31日，中国代表熊斌、徐燕谋等6人与日本代表冈村宁茨、永津等7人签订了《塘沽协定》，把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埋下了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的祸根。

1935年5月2日，接受日本津贴的《国权报》社长胡恩溥被枪杀于日本租界内的北洋饭店，3日，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枪杀于天津日租界白宅内，日方认为，此“乃系国家组织或有力团体所为”，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挟。尔后又以国民政府援助孙永勤抗日义勇军、违反塘沽协定、妨碍停战区内之治安为由，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迫使南京政府派出代表何应钦与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酒井隆、高桥垣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侵略者窃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部分主权，迫使国民党军队部分撤离华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均离开平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国民党驻平津一带的中央军撤往陕西、河南、安徽等地，平津完全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成了一座“孤岛”。

蒋介石想以妥协退让换得暂时的苟安，以卑躬屈膝的和平谈判作为解决中日矛盾的主要手段。1935年7月28日，蒋介石召见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嘱其向日本传言：“只有强者事弱，然后乃有真正同盟，无威胁而成之同盟”。据此，蒋作宾通过新闻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并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① 蒋作宾于8月30日返回东京后，于9月7

^① 《蒋总统秘录》P49

日开始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晤谈，探讨解决中日矛盾的途径。对于中国政府伸出的和谈之手，日本政府把它看作是不战而从中国攫取更多权益的绝好机会。10月7日，广田以秘密外交方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所谓“三原则”：（1）中、日亲善，中国不提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2）、中、日、满亲善和经济合作；（3）、中、日、满共同防共。对此，蒋介石表示“同意”。^①1936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贵族院演说时，公布了“三原则”。

“广田三原则”成了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与广田三原则出笼的同时，驻华北的日军又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935年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声称，他主张立即实行华北五省自治。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22县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作为华北五省自治的“先声”。1936年5月12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以察北为根据地，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对此，南京政府无能为力，莫可奈何。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它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进一步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解决中日民族矛盾，成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迫切的、首要的任务。

然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外患未尽，内争不已。占据统治地位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时，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

^① 《蒋总统秘录》P49

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①这实际上是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仍然把国共之间的矛盾看作主要矛盾，因而使得蒋介石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把“剿共”当作第一要务。1933年，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的训词中，把东三省和热河失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什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任的”。他要求国民党将领“要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他扬言：“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要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②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蒋介石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出卖民族利益，另一方面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进攻苏区和工农红军，损耗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地破坏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合作，削弱了国防力量，更进一步地加重了民族危机。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投降、对内血腥屠杀，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且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这就使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在抗日的旗号下可以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P5

②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P6

义出中国，这是历史的潮流，只能迎，不能拒，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必然被历史所唾弃。张学良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刺激下，迅速清醒过来，摆正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位置，抛弃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毅然举起抗日大旗，为历史留下了一席美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是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变化、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并不是唯一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客观原因的交互渗透和交互影响，也不一定会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

二、局部抗战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局部抗战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是促使张、杨政治思想转变和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当局一片妥协退让的言行中，爱国军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首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是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1931年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的嫩江桥，马占山将军率全体将士奋起抵抗，揭开了东北抗日战争的序幕。接着，被打散的东北军将士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纷纷聚集在马占山、李杜、苏炳文、丁超等的指挥下，最盛时达30万人以上。但是，由于这些武装分散作战，缺乏统一组织、统一部署和统一指挥，先后被日军各个击破。但他们的义举，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全国人民对日作战的信心和勇气。随后，各种抗日武装、抗日游击队风起云涌，给日军以极大的打击。

1931年12月27日，日军进攻锦州，在敌我力量悬殊、孤立

无援的情况下，守城的东北军将士英勇顽强，坚守不退，凭自己的血肉之驱，与日寇周旋了一个星期。在锦州保卫战期间，守城的将士们悲愤地发表过两次宣言，强烈呼吁南京政府出兵对日作战。在12月31日的宣言中说：“日军三路取锦，血战五日，死伤枕藉”，“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军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在1932年1月3日的第二次宣言中说：“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锦州之陷在目前，回视枪中炮中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如此而谓其共赴国难，岂不念生者寒心，而死者瞑目乎”。由于弹尽援绝，锦州终于失陷。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盐泽狂妄声称：用四个钟头占领上海，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叫嚣，只用三个月即可占领全中国。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将士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的领导下，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拒绝蒋介石撤退的命令，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以四万兵力抗击日军十万之众，在一个月时间内，打得日本三易主帅，毙伤日军万余人。据当时上海英国人创办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华兵之抵抗力非常强，猛烈之炮火加于彼等，彼等屹然不动，当其阵地为炮火所毁时，彼等即以福枪兵士伏于其口，准备抵抗日兵之进攻，故日军终不能前进”。淞沪抗战虽然被蒋介石所出卖，但爱国军民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流血牺牲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同时，也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其四个小时占领上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从而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的信心。

1933年1日，日军攻陷热河后，接着又向长城各口进犯。这时长城内外中国守军约30万人，从未接到出击的命令。当日